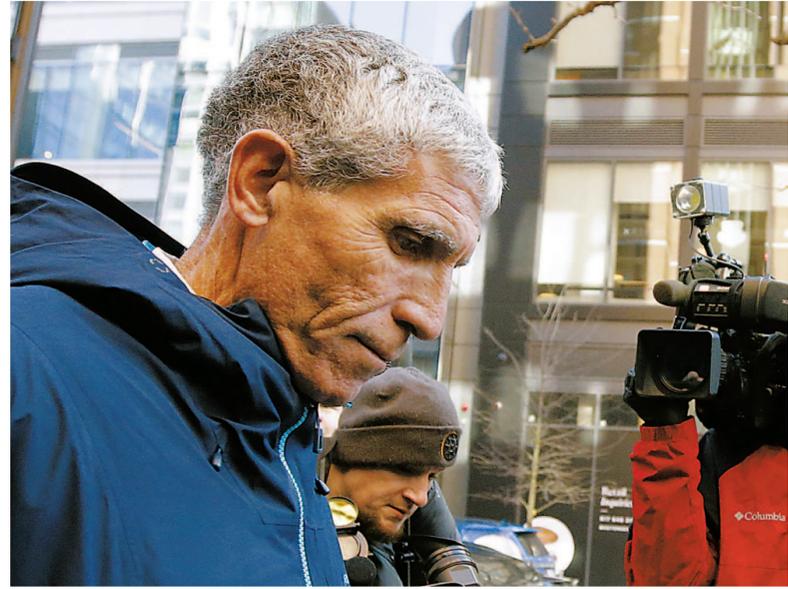


今日聚焦

通过找“枪手”代考、冒充体育特长生等方式串通舞弊,耶鲁、斯坦福等多所大学“中枪” 史上最大名校招生丑闻波及六州,震惊全美

■本报见习记者 杨瑛

SAT能替考吗?能!体育特长生能造假吗?能!最近,美国民众被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桩美国名校入学舞弊案惊掉下巴。据多家媒体报道,自2011年起,升学中介和家长们通过合谋欺诈、贿赂等方式,让子女进入顶尖学府。截至今年2月,调查横跨全美6大州的200家中介机构,已有50人被起诉,包括3名机构组织者、33名家长、多名大学教练、行政人员和考试机构人员,涉及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南加州大学、乔治城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名校。涉案金额高达2500多万美元。



12日,辛格离开波士顿联邦法院。此前,他承认在名校招生舞弊案中受到的指控。 东方IC

“足够厚颜无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论称,串通舞弊的过程“很简单,但足够厚颜无耻”。一个女孩从来不曾踢球,却突然成了耶鲁大学的足球明星。这不是奇迹,是她的父母花了120万美元。还有一个高中男生以学习障碍为由要求替换入学考试监考官,然后串通拿了高分。这也不是天方夜谭,他的父母花了5万美元。

《纽约时报》介绍,入学舞弊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一是把孩子伪装成体育特长生。由于美国高校招生对体育特长生有优待,这让家长们钻了空子。通过升学咨询机构的牵线搭桥,家长以慈善名义向学校“捐款”,实际上是向大学体育教练及其他一些可以左右录取结果的人员行贿。受贿者推荐或认定其有资格加入该校运动队。经过此番操作,这些孩子可以在录取时获得额外加分。但这些学生实际并不具备出色的体育能力,在入学后也未打过比赛。

美国经典喜剧《欢乐满屋》的主演洛莉·路格林就选择了这条旁门左道。她和丈夫向中介支付了50万美元,将两个女儿包装成划船运动员,但她并不具备运动员能力也不会参赛,再由中介“推荐”给大学体育部主任。两个女孩最终没有被录取。但路格林夫妇都将面临邮件欺诈的指控。

另一种方式是给学生的考试成绩“注水”。家长先出重金给升学机构,再由机构负责安排“枪手”替考SAT(美国学业能力倾向测试)或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并贿赂考试机构人员,在学生成绩上造假,从而为孩子进名校铺就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

因出演《绝望主妇》而名声大噪的好莱坞女星菲丽西提·赫夫曼就搞了这一出“偷梁换柱”。检方称,赫夫曼花了1.5万美元给升学机

构,由他们安排人代替女儿考SAT。一名证人向检方表示,他曾前往西好莱坞考试中心监考那场考试,企图让事情不致露。赫夫曼的女儿后来获得1420分,比她前一年的PSAT(美国高考预考)成绩高出400分。

各取所需的利益链条

美联社称,案件牵扯出的是一个由金钱和权力堆砌起来的升学产业。而盘查整个利益链条的关键人物,是加州一家名为“The Key”的升学咨询公司创始人威廉·辛格。

辛格一般会行贿赂伪装成慈善捐款,转到一个由他成立的非盈利性慈善基金会。表面上,基金会会给“捐款”的家长发一封道貌岸然的感谢邮件,但其中部分款项却转进了校方相关人员的口袋。波士顿联邦检察官莱兰表示,基金会实则是辛格用于洗钱的一个门面。

“打个比方,学生通过自己努力入学是走正门,有些人通过大额捐款是走后门。”辛格告诉法官,“而我开了一扇边门,确保那些孩子能入学。”辛格已于12日在波士顿联邦法院认罪,

包括敲诈勒索、洗钱、逃税和阻碍司法等多项罪名。目前,辛格慈善账户中的520万美元已被查封,法院将于今年6月对其进行审判。

与此同时,位于利益链一端的,是不惜用“歪路子”也要让孩子进名校的家长。讽刺的是,33名涉案家长都属于“富裕阶层”。除了好莱坞明星,涉案家长还包括私募基金的创始人、新港航运供应商、房地产公司创始人、投资公司总裁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家长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各施手段,比如,加州一酒庄老板行贿南加州大学,帮助他所谓的水球特长生女儿入学;洛杉矶一家精品店企业CEO付了5万美元找人替儿子考ACT;还有纽约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向辛格支付了7.5万美元,用于买通其女儿ACT考试的监考官,“在她答卷以后修改答案”。

利益链的另一端,则是名校管理者、教职人员和体育教练。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他们铤而走险。根据CNN报道,一名乔治城大学的网球教练在2012至2018年间共收受辛格贿赂270万美元。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前招生主任莎拉·哈勃森表示,尽管大学体育教练没有权力直接决定录取哪些学生,但他们在招生环节中

仍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向招生办推荐“指定人选”。

不过,涉事学校都急于摆脱这滩脏水,陆续发布声明称对这些暗箱操作并不知情,后续会展开内部调查和处罚,并将学校描述成职工个人犯罪的“受害者”。

目前,已有多名涉案学校员工被解雇、停职或面临敲诈勒索的指控,涉案家长也面临邮件欺诈、诚信欺诈等指控。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检方不排除会有更多家长和教职人员“落水”。

不过,那些走捷径进入名校的学生不会受到起诉。在检方看来,这些青少年对这一切肮脏行径并不知情,“他们的父母才是始作俑者”。涉事学校也并未表示要开除或是处理这些学生。

辛格的骗局之所以得逞,一定程度是涉案家长长期盼子女上名校,深陷焦虑。与此桩案件无关的独立教育顾问协会首席执行官马克·斯科拉罗认为,对掌握各种资源且渴望孩子获得成功家长的而言,上名校如同“买名牌”商品,“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斯科拉罗说,这桩丑闻“显然说明一个事实,即(大学)招生过程出故障了”。“(升学)充盈焦虑,尤其是精英学府……那些百万富翁可能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不’,试图操纵(招生)系统录取自己的孩子,这不足为奇。”

入学机制的不平等

一直以来,美国普通民众对于“富二代”轻松上名校质疑颇多,为什么富豪捐一栋楼就能让孩子进哈佛?有钱难道就能使鬼推磨?

美国媒体指出,这桩丑闻折射出美国高校入学机制的严重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也是催生辛格这类不良升学咨询机构的土壤。最令人感到困惑和沮丧的,不是嫌疑对象们的不法行径,而是即便不通过欺诈等非法手段,富人的后代要进入名校也会更容易。

比如,美国大多数排名前100的高校素有“继承录取”(legacy admission)的传统,即让校友子女在申请母校时享有特殊优待。2018年一项新生家庭背景调查显示,哈佛大学当年新生中约有14%来自“继承录取”,耶鲁大学的这一比例为11.6%。

有教育专家批评称,如今这一传统逐渐倾向于那些腰缠万贯的校友,富人可以通过捐赠提升孩子的入学几率。美国媒体也将该政策诟病为“白人特权”和“灾难性政策”。还曾质疑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就是这样进入哈佛的。不过,由于“继承录取”可以给学校带来更高的关注度,因此这项政策基本无法撼动。

新闻分析

“这个竞技场并不公平”

■本报见习记者 杨瑛

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司法部迄今为止最大的高校入学诉讼案,涉及范围之广、行径之恶劣令人咋舌。但教育和司法界人士也指出,诉讼可以给各大高校敲响警钟,甚至引发一场关于教育公平的抗争,但也只能撕开美国教育不公和社会贫富不均的暗角。

展现社会优势的试验场?

《华盛顿邮报》指出,在辛格为富人家长和孩子制定一对一的“人生制胜战术”时,最受伤的莫过于那些有能力又刻苦的普通孩子,被本属于他们的知识殿堂拒之门外。

有媒体报道称,过去20年间,辛格帮助不胜其数的申请者获得了“一切可想象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产学历”。从更广泛的层面看,舞弊案反映出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导致的教育问题。

抛开特殊机制和那些“旁门左道”,SAT、ACT等美国“高考”都属于标准化考试。但由于富人孩子有更多获得导师培训、专业课程和在精英私立高中接受大学预备课程教育的机会,他们即便不作弊也比普通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有美国教育作家表示,大学入学已成为“展现社会优势的试验场”。

只是美教育问题冰山一角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致使同辈的富裕家庭孩子比贫困家庭孩子知识水平高出数个年级。此外,种族和阶层也是影响学校教育的关键性因素。高收入和白人家庭孩子拥有竞争优势,低收入和非洲、拉美等少数族裔家庭则处于弱势地位。而基于这种认知,学校也通常会低估少数族裔学生的能力,使他们更难进入“优秀”学生行列。

CNN评论称,这桩丑闻只是美国教育问题的冰山一角。也正如辛格对检方所言,“这个竞技场并不公平”。然而,究竟什么是教育公平,谁来决定那些没有特权的孩子的机会,升学咨询机构和家长又应在孩子择校时扮演何种角色,种种问题都值得美国社会深思。

国际观察

中美在中东合作,验证相处之道

■潘光

近期,美国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今后就是竞争关系,几乎没有合作可言,甚至主张中美“脱钩”。国内学界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中美合作不限于被称为“压舱石”的经贸领域,还可扩展至安全与国际事务等领域。这里,笔者以中美在中东和阿富汗的合作为例谈一些事实和看法。

一条“谨慎的龙”

在中东,中美的合作与协调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促进伊拉克的稳定和重建、维护埃及和黎巴嫩稳定、支持巴以和平进程、对海合会成员国功和促谈、继续合力反恐和打击海盗。

先看伊拉克。美国政府表示,要在叙利亚留驻200名军人,在伊拉克的驻军则将长期存在,然而,伊拉克的稳定和重建仅靠军事力量显然不行,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出售石油是伊拉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伊拉克阿达布、鲁迈拉、哈法亚三大油田均由中国企业为主的集团经营,其盈利对伊拉克战后重建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还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建立了领事机构,这对伊拉克的稳定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再看埃及和黎巴嫩。中美在维护两国稳定发展方面有着并行不悖的利益。长期以来,美国给予埃及、黎巴嫩大量援助,把两国视为重要伙伴。同时,中国在埃及、黎巴嫩和阿联酋日益增强。习近平主席2016年初访问埃及时,中埃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等21项合作文件,中国还援建了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等重要项目,中埃的安全、反恐、军事合作也不断深化。在黎巴嫩,一千多名中国士兵参加了联合国维和部队,为这个国家、特别是黎南地区的安全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美在巴以冲突问题上虽然存在分歧,但在支持“两国方案”,反对在被占领土上建立新定居点,维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益,保障以色列安全等方面立场接近。由于将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美国目前难以在巴以之间扮

演公正的调解人角色,而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则继续在巴以之间努力劝和促谈,发挥美国难以发挥的作用。

海合会成员国都是中美的好朋友,而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等国的冲突也给中美两国都出了一道难题。目前,中美都在双方之间劝和促谈。美国进行调解的本钱是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和与它们的巨额军售生意,但能源纽带随着美国油气的自给自足正逐渐消减。而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合作正在“一带一路”框架内迅速发展。沙特在对华供油国名单上长期居于首位,卡塔尔成为对华提供液化天然气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义务和阿拉伯的迪拜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海上通道的两大支点——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迪拜“龙城”是中国在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商品贸易中心,我在那里见到了从沙特开车过来的一家人,他们解释为什么跑那么远来购物:“我们需要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而且价廉物美。”从长远来看,中国也许能在促进双方和解方面发挥更为深层次的作用。

中美都参加了中东反恐和打击海盗的国际联合行动,中国的三艘军舰常年在亚丁湾巡航,为维护海上安全做出了贡献。2001年“9·11事件”后,中美建立的双边反恐合作机制一直运转良好。两国所签的民航安全、集装箱安全等反恐合作协定在国际间并不多见,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还联合进行了搜救、反恐、战地医疗等方面联合演习。这些全球范围合作,为中美在中东的反恐安全合作创造了良好氛围,也在中东产生了直接效应。中国在吉布提建立的补给基地有助于中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反恐、搜救、打击海盗行动。这个基地正好与美国在那里的基地相邻,又为双方的合作创造了另一个契机。

我的老朋友、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安德鲁·斯考普尔在其新著中指出,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中美之间在中东可以开展合作。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

在阿富汗合作互补

在阿富汗,中美的合作与协调更为具体。在参加中美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对话和研讨时,美方与会者向我们

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一个阿富汗小城,一群中国工人正在修筑一条美军要使用的公路,而保护这些工人的是美国士兵。为此,美国人经常埋怨:只有中国工人还留在阿富汗,其他国家的劳工都“溜了”,只有美国士兵还在阿富汗作战,其他国家的军人不是撤走了就是“躲在非战斗地区”。这样的话语非常生动地显示了中美在阿富汗的互补作用:美国的军事存在,中国的经济投入。但是,美国军队的飞机坦克无法打赢战争,更难以解决阿富汗的经济和民生问题,而中国与阿富汗的经贸合作也因安全风险而举步维艰。例如,仅2004年,就有11名中国工人在阿富汗的暴恐袭击中丧生,中国企业在阿经营的铜矿和油田因安全风险而难以运作,阿富汗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良好愿望也难以落实。显然,中美在阿富汗只有进行合作,才能达到双赢局面。需要指出,目前中美在阿富汗已有一些合作,特别在反恐、反毒、培训方面,如举办扫雷培训、警察培训等,但还远远不够。

观察人士还指出,美国迟早要撤出阿富汗,它不可能缺少中国的帮助。

“共同演进”是好思路

从上述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中美双方在阿富汗均有重要利益,并为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美国的行动往往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而中国的行动往往辅之于经济合作,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双方之间存在竞争甚至摩擦,但大多数情况下又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其次,中美双方在阿富汗的外交努力都十分活跃,双方的目标并不相同,有时还会发生碰撞,但其轨迹往往并行不悖,许多情况下具有互补性。倘若中美合力推动某一进程,则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再次,上述两点在中美处理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时往往也有所表现。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前几天提出,中美关系路线图应是“共同演进”(co-evolution),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总之,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看,如王毅外长所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确实是金科玉律。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高级顾问)

推进企业联合治理 共同捍卫阳光诚信的商业环境

3月7日,阳光诚信联盟2019年会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成功举办,来自民企、合资企业、外企的250家企业代表共同发布联合治理倡议书,“行业共治的反腐新模式已经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交了一份企业反腐的成绩单,阳光诚信联盟成员单位将秉承开放的心态,务实的作风,用坚定的决心和创新的行动进一步推进企业联合治理。”

“2019年会主题是‘联合治理·共创价值’,希望联盟成员单位能够更加开放,通过联合反腐、联合审计,打通上下游,在腐败预防方面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京东集团首席合规官李娅云在代表阳光诚信联盟轮值主席单位致辞时表示,希望阳光诚信联盟的所有成员单位在2019年围绕企业合作、校企合作以及政府合作方面能够开展更多的创新合作模式。在此次年会上,400多名与会代表分别从大趋势、多视角、务实谈、科技反腐四个方面交流了企业廉洁管理的成功经验,同时还分享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行企业反腐的创意和实践。

阳光诚信联盟秘书长、京东集团内控合规部总监段秋斌在此次年会上表示,阳光诚信联盟成立仅仅两年的时间内,成员数量就从最初的13家增加到现在的250家,其中上市公司占比超过一半,60%为互联网企业,员工规模数百万。通过对失信名单共享系统与企业的HR系统对接,自动识别失信人员,有效提升了企业识别失信人员的效率。

阳光诚信联盟在反腐上的先进经验受到了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充分肯定。在2018年9月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中,首次将阳光诚信联盟的反腐创新经验纳入书中,这也是民间行业共治组织的反腐败经验第一次写入蓝皮书;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积极评价了阳光诚信联盟的失信信息共享机制,对接企业HR系统,对失信人员自动识别、永不录用,增加腐败人员的失信成本。目前在联盟企业内部已经建立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潘小军(左)与阳光诚信联盟理事会会长江卫华(右)在战略合作仪式上。

了行之有效的联合治理机制,借助于这一机制,联盟成员单位可以开展更有效的联合治理。在2018年8月和10月,同程旅游与驴妈妈旅游、德邦快递与京东分别在两起内部腐败案件中通过这一机制开展了联合调查,极大地提升了内部调查的效率,完成了对离职失信人员的查处。

合规及监察专业人才短缺,一直都是困扰着企业开展反腐工作的痛点,特别是在反腐力量较为薄弱的民营企业。阳光诚信联盟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达成战略合作,将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建立阳光诚信联盟审计监察人才培训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明军教授在联盟年会上表示,未来双方将共享信息资源和学术资源,共同促进联盟各成员达成既定目标,提升企业内控部门的内治能力,加强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通过此次战略合作,双方将在企业反腐领域积极探索校企合作,为行业建立专业、稳定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解决企业在合规及监察专业人才储备上的痛点,另一方面也通

过方式为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实习基地的机会,使毕业生具备实战能力,实现精准就业。

来自美团点评、58集团、小米、滴滴、永辉集团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带来了企业反腐策略、采购环节的腐败预防、廉洁信息平台建设、廉政宣传探索零售企业腐败治理的分享。来自科大讯飞、唯品会、国美、字节跳动、美亚亿安等5家互联网企业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分享了他们如何借助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实现精准反腐。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使用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提出了使用界限上的思考。阳光诚信联盟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不但有助于外部的司法处理,也有助于内部防治。”华东政法大学司法改革与判例研究中心主任孙万怀教授针对科技反腐的企业实践经验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孙万怀教授认为“这种预防某种意义上不仅是企业内部健康发展的要求,同时更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企业都在强化风险防控上讲究合规和反腐,整个社会的反腐环境就会持续优化。”